

传统与现代的文脉 该如何融合

——评龚学敏诗集《白雪与挽歌》

□白浩

的长刀……刃是走在前面的那片雪”“万千的雪片是我用自由且纤细的手 / 磨出的刃。我用红色的火 / 奔跑。信仰所至，遍野都是 / 我的名字 / 都是我刀刃的名字”，诗歌以监禁中向外望的视角，寄情于寒风和雪片，驾驭不受限制的风雪驰骋万里，化身战斗的豪情，豪迈的战斗精神充盈天地。

对于酷刑并不随意夸张化表现，“把指甲拔去吧，掉在地上，这样 / 我就把大地抓得更紧”“把牙齿拔去吧，天上一些，地上一些 / 让我将泼天盖地的仇恨咬得更狠一些”，以意志化酷刑折磨为战斗的想象，既有贴切的细节吻合度和代入感，更表达出诗歌的力度。

“宁儿是遍地的月光。我朝着哪里 / 唱摇篮曲 / 哪里就是抚摸你的手”，穿着的红衣、纤细的手、对孩子的挂念，这些温柔的情感、外表的美丽，都是以女性身份日常化、生活化的贴切经验，真实而细腻地复活场景，更将爱与恨、温柔与豪迈、酷刑与意志之间强大的反差张力，营造出诗歌的力量感。

又如《杨靖宇》中，“风，用机翼的刀 / 把天空刮得比空坛子还干净……此刻，将军怀揣的黎明 / 正在被刽子一样密集的刺刀，一步步逼近”，空坛子、篋子，这些熟悉而温馨的江南化的日常生活意象，带来场景融入感，也为英雄的壮烈行为带来反差感。这是在日常化意象

观照和融合理解下的抗战史、英雄史的重写、重述。

想象的丰富、内容的贴切，消除了时空距离和情感距离，真实的情感与个人经验熔铸代入感带动场景的营造、想象的飞扬和奇崛的创造，并不突兀生硬，情感的共鸣真实自然。

对于成熟的诗歌写作者来说，想象的丰富、修辞技术的使用并不难，真实真诚这看似起点的东西反而成为写作的难度。正因如此，《白雪与挽歌》的个人性、真实性、代入感成为其诗歌创作的起点，也是其技术性腾飞的基础，合起来成为摆脱主题性写作中同质化的关键。

《白雪与挽歌》将形式美学与意义美学并飞，融合推进，在诗歌传统艺术形式的新旧融合中实现文脉传承和创造性转化发展。

《十二烈士山》每节开头以“战士 × × 倒下”复查，12名战士的牺牲逐一节叙述，节内分别集中于雪、桦树的泪、阳光、雨、土地、被子、树叶、石碑、刀、鸟鸣、雪、松树等核心意象，在排比复查中错落有致，情感逐层递进，万物调动、万物交响形成各种合奏协奏曲。情绪的铺排推进如潮水般叠浪推进，既形成史诗般的场面感和过程性，又具有逐浪高的史诗吟唱感。终章合奏：“小孤山长成十二烈士山。一座新来的山 / 鸟瞰原野”“他们的姓名排成十二个

月，用每刻时间 / 簇拥祖国的版图”，在轰鸣中再上高潮。

《魏拯民》在第一小节以“密营饿了”“粮食饿了”复查推进至“饥饿在饥饿中昏迷”“连饥饿自己都饿了”，在第二小节转至“冬天来临”复查。《金锦女》在第一小节以“有活着的吗”的问答复查，在第二小节变奏，转至“一只小百灵，用少年中国的嫩绿 / 飞过森林”复查。均是排比递进，音韵与剧情性过程性同步铺开，使全诗格局宏大，山河回响，轰鸣不止，有歌剧性风采。

分节歌强化了诗歌的抒情节奏，情感推进更具层次。分节间的呼应与问答中的张力，不仅贴近民间歌谣的传统结构，也增强了叙述的互动感与现场感，历史记忆在复查与变奏中获得回响。

这种形式选择并非单纯的技巧展示，而是与主题情感相契的整体构造，使庄严与哀婉、个体与集体在音律流转中达成平衡，进一步深化了诗意的真实与厚度，也形成史诗性美学风格。

庄严肃穆的主题与大量的个人化、日常化经验结合，抒真情；化用民歌、赋体等传统文化成分，诗歌内容与节奏结合，形神相谐，在对熟悉的审美形式回归中又创新创造，在现代白话诗诗歌三美建设中进行新的实践。

《白雪与挽歌》以有意味的形式反推意义的表达、情感的张扬，以形式凝聚意味，放大意味，形式和意味同步推进。

回归诗歌的源头，即源自个人化、生活化经验的真实，情感的真挚，达成可理解的艺术想象，在表达性和交流性之间达成传统诗学与现代经验的彼此消化。

新诗的发展始终要面对并处理和旧诗、传统文脉的断裂与传承发展的问题，《白雪与挽歌》的探索让人想起一首《插秧歌》：“低头便见水中天，后退原来是向前。”

诗歌中的文脉延续与精神传承

□张虹云 蒋登科

除了血与火的壮怀激烈，沉淀于历史深处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同样在当代诗歌中找到了新的知音。士大夫的忧国忧民、耿介不屈与豁达超脱，成为诗人观照现实、安顿自身的精神资源。《诗刊》2025年第10期刊发的汤养宗的《苏东坡：惠州的萤火虫，天空上的月亮》巧妙地苏轼人生的两种境遇并置：“庙堂之上，你是光华耀天的皓月 / 在惠州，却成了一枚乡野的萤火虫 / 被换作明灭不定的东西 / 依然是你‘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 为取悦夜空，你开启了一种晦重的生活”。这种在逆境中依然保持精神独立与生命热忱的品格，正是苏轼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传统文化中开放包容的精神亦被书写。《绿风》2025年第5期刊发的邓汉平的《轮台长歌·绮梦千年》，回溯张骞西征、开辟丝绸之路的壮举：“伊犁河畔，战火连天纷争惊悚不安 / 历史的尘埃中，掩藏着未酬的壮志与悲壮的离歌 / 张骞西征越千山，西域风云幻梦间浮现 / 只为开辟丝绸之路，险阻不畏难，心间摇曳千秋业”。诗中“丝路之上，文化火花如繁星点点 / 交织在一起震撼着彼此心田与灵魂”，描绘的正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壮丽图景。

日常生活中沿袭的传统习俗与仪式，维系着社会的伦理秩序，也安顿着个体的精神归属。在快速发展的今天，诗歌成为记录、反思这些习俗的有效载体。有的诗歌记录着传统信仰与宇宙观。《诗潮》2025年第9期刊发南书堂的《问月》：“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 古人今人不休追问 / 估计后人也是这样”。月亮作为一个古老的文化符号，是中国历代诗人

寄托情思的共同意象，连接起古人与今人，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天人感应、物我同一的哲学思想。这恒常的追问，指向的是人类对永恒、对未知的共同追寻。宗法制度与家族观念，则具体体现在村落与宗祠之中。《诗刊》2025年第9期刊发的周夬的《溇潭古村》描绘了一幅在时间中衰败又坚守的图景：“只有宗祠 / 替这座千年古村，保存着姓氏和余温”。宗祠不仅是实体建筑，更是家族血脉与文化记忆的守护神，是漂泊游子精神之根。《星星·诗歌原创》2025年第10期刊发周占林的《孔庙》：“历代朝圣的虔诚 / 就像雨滴 / 沿低垂九脊滑落 / 一个朝代的风雨 / 被蛀蚀的康熙匾匾已经金漆斑驳 / 那一横一竖 / 矗立成华夏文明的脊骨”，诗句里孔庙象征的儒家文化与文明道统，在诗中获得了具象而坚韧的表达。

文化的创造与传承离不开人。那些看似平凡的手艺与人物，构成了传统文化坚实而富有温情的基底。诗人将目光投向这些风景，用文字为无名者立传，铭刻那些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手艺。《星星·诗歌原创》2025年第10期刊发的高仁斌的《一群会石刻的手艺人》表达了对朴素的无名匠人的歌颂：“这群会石刻的手艺人，没有留下名字 / 就像他们生活的朝代，没有留下反思”。诗人没有停留在对技艺本身的赞美，而是敏锐地捕捉到匠人与土地、与历史的血脉交融。同一期，高鹏程的《民间技艺（组诗）》展现了诗人对传统手艺的珍视。其中，《富阳草纸》写到，“正是有了这种物美价廉的草纸”，才使世界变得更加干净。“草纸”代表着最基

础、最实用的物质文明成果，诗人通过对比暗示：真正改善人民生活的实用发明，比空谈道德的文章更有价值。在《金村窑场听青瓷烧制讲解》中，他描绘了传统技艺的核心，“最难的，依然是窑温的控制 / 1260度。这是梅子青玻化期 / 需要的烧制温度 / 然而如何掌握，完全取决于师傅眼神 / 审视窑火瞬间的感知 / 这是泥与火的艺术。这也是火与水之间的 / 秘密协议 / 只有最有经验的窑工才能掌握”，通过经验积累掌握的技艺是现代科技难以替代的人文温度。除了手艺，那些承载着民间记忆的平凡人物同样是诗歌关注的话题。《诗刊》2025年第9期刊发胡丘陵的《推鸡公车胡良风》：“肩上，长满路边的荆棘 / 是一根不能折断的扁担 / 他推走一个又一个黄昏 / 将一家人颠簸的日子 / 推得稳稳当当”，诗人用具有画面感的语言，塑造了一个坚韧的劳动者形象。这不仅是个人的命运的写照，也是千千万万在历史长河中默默耕耘的普通人的缩影。这些人物、技艺和艺术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文化化的温度。

纵观当下的诗歌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并非如冰冷标本一样陈列于博物馆，而是活生生地流淌在当代诗人的笔端。诗人们以个性化的感受和现代性的表达，让民间手艺的温度、抗战精神的铁血、士人风骨的高洁、古老习俗的余温，在分行文字中重新苏醒。在技术理性日益凸显的今天，诗歌对传统文化的深情书写，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深沉的文化定力，也为漂泊的现代心灵找到了可以皈依的精神家园。

在当代文学谱系中，民族文学书写以其独特的音色不断丰富着我们对文明多样性与人类精神谱系的理解。它们既是特定族群身份认同的回响，也是穿越时空、抵达普遍人性的悠远呼唤。羌人六的《尔玛史诗》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它连接着羌族古老的神奇秘境与现代读者的心灵世界。小说深深植根于川西北“断裂带”的文化土壤，以一种兼具学术与艺术的方式，激活了一个民族集体的文化记忆，并试图在史诗的宏大框架内，回应关于起源、信仰、英雄、爱与和平永恒命题。《尔玛史诗》以羌族经典史诗为叙事主线，讲述了羌族的迁徙、生存与挣扎。故事始于动荡岁月，描绘了祖先们在大山中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贯穿于多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外围影响。书中不仅记录了一个古老文明特有的风俗，更以饱含血泪的笔触，刻画了木姐珠、阿勿巴吉、斗安珠、阿巴白苟、泽基格布等在岁月洪流与自然暴力下的坚韧命运。全书既是对一个民族坚韧生命力的礼赞，也是一曲为行将消逝的乡土文明所唱的深沉挽歌，深刻探讨了传统与现代、灾难与重生、个人与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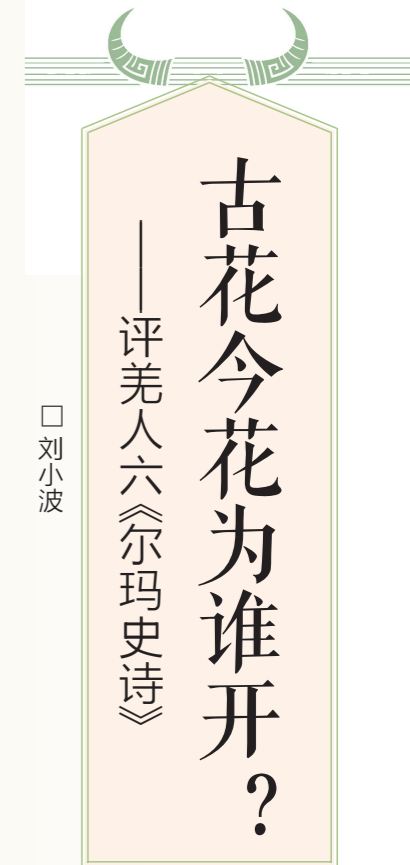
“想走的路，一定会到”。《尔玛史诗》的写作建立在扎实的文献研究基础之上。羌人六为这部作品做了充分的准备，涉猎千万余字的民间文学资料和相关论著。文末所附长文创作漫笔是无法绕开的一个互文本。这种文献学意义上的爬梳不是简单的素材堆砌，而是对羌族文化体系的深入理解与重构。作品聚焦于羌族最具代表性的几大史诗，兼及数十种其他史诗，从中汲取养分。这些史诗涉及生活生产、转移迁徙、爱情婚姻、战争与和平等多个主题，构成了羌族文明从原始走向理性的完整脉络。上古歌谣、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在字里行间自然流淌。值得注意的是，羌人六在处理这些古老题材时并非简单复述，而是在原汁原味地保留民间底色的同时，赋予其当代价值与表达形式。

地缘情结是《尔玛史诗》个性锋芒的重要来源。羌人六的出生地平武县位于龙门山断裂带，这一地理空间不仅是羌族文化生存的实体场域，更是他的精神原乡。在散文集《绿皮火车》中，他已构建出“断裂带”这一文学地理概念。这种地缘认同在《尔玛史诗》中进一步升华为民族认同文献基础与地缘情感的互文，使《尔玛史诗》既具有文化志的学术价值，又充满文学表达的个性锋芒。作者穿梭于历史与当代、族群与个人之间，将古老的羌族史诗、神话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叙事。

羌人六采用了一种既新奇又不猎奇的写作策略，在魔幻与现实之间找到了平衡点。魔幻元素在作品中自然流淌，源自羌族文化特有的神话思维和万物有灵观念。不少超现实的描写不是为猎奇而设，而是羌族原始思维的表现——在他们的神话体系中，人神共存、万物有灵是基本的认知模式。魔幻叙事背后，是鲜活的民族情感和厚重的文化积淀。现实维度同样在作品中占据重要位置。《尔玛史诗》实现了对羌族精神史的全景呈现。作品既有从神灵的世界走到现代生活的全部历史的纵向脉络，也有涵盖生产、爱情、战争与和平等多维度的横向展开。这种叙事策略使得羌族文化不再是博物馆中的标本，而是活生生的、与当代对话的精神资源。

“古花今开，今花今开”。《尔玛史诗》虽根植于羌族文化，但其精神内核——如对牺牲、仁爱、自由等共通人性的颂扬——却具有超越民族的普遍意义。尤为可贵的是，它并未固步自封，而是通过描绘古羌人与古蜀人等民族的交往融合，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两岸的山看得见不会碰头，两河的水看不见也会合流”的比喻，正是这种开放包容心态的诗意表达。这些善与美的品质在羌族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更加熠熠生辉。这部作品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羌族文化，也为当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尔玛史诗》的文学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独特的诗性特征。羌人六有多年诗歌写作经历，在散文集《绿皮



火车》中已展现出对诗性语言的驾驭能力，这种诗性表达在《尔玛史诗》中得到了延续和升华，通过诗性逻辑实现了民族历史的审美重构。意象系统的精心构建是作品诗性的另一表现。羌人六擅长通过意象传递复杂的情感和思想，如《绿皮火车》中的绿皮火车既是具体物象，也是时间与记忆的象征。在《尔玛史诗》中，火、羊、白石等羌族文化中的核心意象，构成了丰富的象征系统。以白石为例，它源于神话史诗之中，是羌族多种崇拜的象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神圣与世俗。这种诗性既体现在作品的神话思维结构上，也表现在语言的艺术表达中，与羌人六的诗歌和散文创作一脉相承。神话思维为《尔玛史诗》提供了深层的结构逻辑。在羌族的原始观念中，“人神共居于世间”，这种世界观打破了理性主义设定的界限，创造出一种更为广阔、更具诗意的叙事空间。这种神话思维不是简单的文学技巧，而是羌族“万物有灵的世界观”的自然流露，是这个古老又神秘的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表现。

《尔玛史诗》同样民族历史与个人视角相结合，实现了从小我中挣扎出去的蜕变。通过神话思维、诗性语言、意象系统和史诗气魄的多维建构，《尔玛史诗》实现了民族历史的美学转化，使古老的羌族文化以生动的文学形式焕发新的生命力。羌人六不仅在叙事的层面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古老民族波澜壮阔的精神迁徙史，更在方法与价值的层面，为当代民族书写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范式。小说在魔幻与现实之间所搭建的叙事空间，既是对羌族“万物有灵”世界观的真切呈现，也是一种极具现代性的美学策略，它使得那个“人神共居”的世界变得可信、可感，甚至成为映照我们自身处境的一面镜子。而作品中始终闪耀的，关于牺牲、仁爱、和平与包容的人性光辉，则超越了族群的边界，成为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一份珍贵的精神资源。《尔玛史诗》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还原”了一段历史或一种文化，更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对话的可能——过去与现在的对话，羌族与世界的对话，神话与现实的对话。它并非将民族文化封存于文学的琥珀之中以供观赏，而是让其成为一泓活水，持续滋养着更为广阔的文化原野。

“羌去何处”。《尔玛史诗》以羌族深厚文化遗产为基石，通过文学重构而成的民族精神画卷，写出了属于他们的创世神话。作品立足于作者对千万羌族民间文学与史料系统性学术准备，以强烈的“断裂带”地缘情结为内在驱动，提炼并激活了羌族最具代表性的几大史诗，共同串联起羌族文明从原始启蒙到理性成熟的完整脉络。作者采用了一种现实与魔幻交融的叙事策略，再现了羌族从西北迁徙至岷江上游的壮阔历史及其在古蜀大地上与其他民族交往融合的生活图景。最终，这部作品超越了单一民族历史的记述，在对那些永恒价值的书写中，挖掘出跨越族群的人性共相，成就了一部兼具文化志学术价值与强烈文学个性的民族精神新史话。

本版责编：崔耕